

# 高鹤年居士与近代慈善事业

◎ 纪华传 安修

高鹤年(1872-1962)是中国近代著名佛教居士,同时也是一位为朝山访道而四处行脚的旅行家,以及为赈灾救难而四处奔波的慈善家。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遭受内忧外患、人民饱受苦难的时期,也是中国佛教历经艰难百废待兴的时期,佛教界忧国忧教的高僧大德与在家居士,抱着自利利他、出世即入世的精神,努力开展佛教界的革新运动和济世利民的慈善事业,高鹤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。他19岁开始行脚天涯,游访名山,真参实修佛法,不遗余力地为诸高僧大德复兴佛教护法,不惮艰辛几十年如一日地南北奔走救灾,兴办各项慈善事业。花甲之年的他还舍宅创办刘庄净土院,安置贫苦老年妇女,使其念佛修行,安度晚年。高鹤年这种居尘而不染,处净而不著,躬亲实践佛法,普度众生的菩萨精神,被誉为“维摩应世,乘愿再来”,堪称近代居士佛教中的典范。

## 一、高鹤年的生平与佛法因缘

高鹤年,名恒松,字鹤年,号云溪,别号终南侍者,晚年被世人尊称为高老居士。其祖籍安徽贵池,后迁江苏兴化刘庄镇,父讳正刚,母王氏。高鹤年生于清同治十一年(1872)农历九月十四日江苏兴化刘庄祖宅内。幼年聪颖,7岁入私塾。9岁时,因同学陈氏夭折,悲感良伴骤失,遁入刘庄紫云山寺,日间买饼果腹,夜里藏在寺里的寿器中,三天后无钱果腹不得已回家。归家后被父亲正刚斥责,颇思出家。恰好此时一

邻居欲往苏州,高鹤年便潜相随行,辗转到苏州穹窿山,入道观拜师,意欲出家。时隔不久,贵池人刘芑林因扫墓至苏州,询问家世,知高鹤年是其远房亲戚,因而携带到刘庄,教以经书佛理。光绪十六年(1890),18岁的高鹤年娶夫人智氏。婚后高鹤年因体弱多病而四处求医。一次,至海州云台山,遇到的一位高僧送给了他几本佛经,这几本佛经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,正如他后来所说:“披读之,如贫者获宝,似渴得泉,知三界无安,犹如火宅,人命危脆,不能偷安,始有忏悔访道朝礼名山之志”。<sup>[1]</sup>认识到生命无常的道理之后,高鹤年立即付诸实践,意欲通过行脚参学找到一条出火宅的解脱之路。

从光绪十六年(1890)至民国十三年(1924),高鹤年在这35年里,靠两脚步行,跋山涉水,顶风冒雪,饥餐野果,渴饮涧泉,历尽艰辛,足迹遍及全国,先后朝礼了五台、九华、普陀、峨眉四大佛教圣地。游历了泰山、华山、衡山、恒山、嵩山五岳以及浙江天目、天台、雁荡,安徽黄山、白岳、天柱,陕西终南、太白等名山。参访了天台敏曦、镜融二法师,金山来果、大定与融通上人,虚云老和尚、印光法师等高僧大德。高鹤年在参访这些高僧大德期间,或得开示,或得受戒,或共参法要,或同住共修,他将所见所闻都一一记录下来。民国元年(1912),狄楚青在上海创办佛经流通处及《佛学丛报》。在魏梅荪、刘朴生等先生的劝说下,高鹤年开始将参访事迹编为游记。但因行脚尚未结束,中途搁



置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),高鹤年终于完成《名山游访记》一书并出版,虚云、印光、谛闲、来果等高僧大德为之作序。1948年,此书修订改版,增加了霜亭法师、吴济时诸居士的序文。到1956年,于正篇53篇之外,又增加了“外编”、“附编”两万余字,始成定本,成为了解近代佛教的珍贵史料。

高鹤年是一位佛教的大护法。中国佛教在屡遭清末兵火焚毁、民初寺产兴学等劫难后,不少名刹仅剩残垣断壁,兴复维艰。高鹤年与诸高僧大德,由行脚而相识,由共参而相知,由心系解脱普度众生而建立友谊,这就使得高鹤年在面对中国佛教这种局面时,成为诸高僧大德复兴佛教的护法者。从诸高僧大德写给高鹤年的书信中,可以窥见他们之间的友谊,亦可从中觅知高鹤年的护法事迹。

虚云和尚为中国近代著名禅宗尊宿。民国十七年(1928),虚云和尚以髦耄高龄赴香港为华亭寺募集重塑佛像急需的款项,但由于人地生疏困难重重。他写信给高鹤年道:“愿公不遗故人,助我一帆。俗云:‘不看僧面看佛面’,正是此也。”<sup>[2]</sup>后来高鹤年不仅从中疏通,使虚云和尚如愿以偿,还帮虚云和尚在江浙一带择请塑匠,并亲自赴云南指导塑彩画圣像。此外,从虚云和尚给高鹤年的信笺中,不论是“每一兴怀,弥增怅惘”,还是“渴念之深,无时或释”,无不体现虚云和尚对高鹤年挚友难觅、得来难守的珍惜。

来果禅师为扬州高旻寺住持,近代著名禅僧。民国十二年(1923),来果禅师因粮食失收,食用欠缺,高旻寺僧俗三百余人生活陷入困境,写信给高鹤年道:“哀恳迅解义囊,接济数百僧人食用,并请转向各同道诸公,尽力陈清敝寺万分困难苦衷。”<sup>[3]</sup>后来又因为时局和荒年的关系,高旻寺的塔殿建设工程不能顺利开展,高鹤年帮助来果禅师募款助修塔殿。来果禅师对高鹤年也是友情诚笃,闻知高鹤年身体稍有不适后,来果禅师便写信道:“老兄之如是为人苛己,上天何不怜人之甚,亦可慨矣。弟恨不能插翅飞来,尽倾离绪,以问痊安。”<sup>[4]</sup>

印光法师是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,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。印光法师给高鹤年的书信共有19封,足见二者关系之深厚。印光法师为佛教界所关注,缘于民国元年(1912),高鹤年于普陀携印光法师文稿数篇至上海,刊于《佛学丛报》。另外,印光法师在人地生疏的江沪一带刻印佛经弘扬净土法门,主要得力于高鹤年的帮助。民国十九年(1930),印光法师到苏州报恩寺弘扬念佛法门,就是高鹤年事先与报恩寺住持清禅接洽好的。对高鹤年的谢意和友情,在印光法师写给高鹤年的信中除多处可见“蒙君照应,不胜感愧”的言词,还有一封真诚为高鹤年所作的像赞。为表达对印光法师的敬仰与怀念,印光法师圆寂后,高鹤年编撰了《印光大师六十年苦行记》出版。

高鹤年一生的重要贡献,即是实践菩萨道,济世利民,积极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。他一生大公无私的所作所为,深得人们的尊重拥戴。1953年,他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,受到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赵朴初等人在车站的热情迎接。1958年,他还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。在高鹤年1962年逝世后,南京佛教代表,苏州佛教代表,泰州政协代表共同为他举办了追悼会。

## 二、高鹤年与近代赈灾事业

高鹤年停止了行脚生涯后,并没有终止劳碌的脚步而安享晚年。相反,从民国十五年(1926)起,年近花甲的高鹤年又开始了奔走四方、专意赈灾救难的慈善生涯。他的救灾足迹北至陕甘,南至湖南,几乎遍及全国。他的救灾事迹,除早年行脚期间参加的救灾外,重要的还有民国十八年(1929)因兴化粮食失收与石金声、王虚白至上海募赈款;民国二十年(1931)在刘庄、白驹场、安丰、水丰圩等处办粥厂14处,设救生团,收容妇孺于贞节院;民国二十一年(1932)江淮和里下河发生水灾,与赵一寰、石金声等设救命团救灾;民国二十五年(1936)因水灾,受委托至苏北了解灾情;民国二十六年(1937)因川、陕、豫、甘等省旱灾,为上海慈

善联合救济会奔走劝募赈款;民国二十七年(1938)助粮 20 石救济江南灾民;民国二十八年(1939)刘庄百余家遭敌机轰炸,与石金声办理善后事宜,安置灾民,后兴化发生水灾,开办粥厂 20 余处;民国二十九年(1940)办刘庄贫民借贷所。他的救灾办法除夏施良药设粥厂、冬济寒衣办织坊外,还舍宅创办刘庄净土院,收容贫苦老年妇女,使其念佛修行,安度晚年。高鹤年不惮艰辛,忍辱负重,其“舍我一命才能救数十万人生”的救灾精神感人至深。

在高鹤年的救灾活动中,以京津勘灾放赈、苏北旱灾和辛未救灾最为典型,影响最为深远。

#### (一) 京津勘灾放赈

民国六年(1917),北京、天津一带发生大水灾,千百万亩农田被淹,千万人民流离失所。在终南山参学修道的高鹤年,知道灾情后,奋不顾身,从终南山赶往京津。在《由终南山往京津勘灾放赈略记》一文中,详细记述了高鹤年赶往灾区以及到灾区后的情况:

初九日出东门,沿黄河南下,重山叠嶂多有匪警,惟救济在急亦不怖畏,午后风雪严寒,颇觉难受。十一日,朔风怒号雪大如掌,余一不顾。廿五里宿观音堂,始通火车。十二日,乘潼洛火车即洛阳城。十三日,搭京汉车北上。十四日,往东西二乡,探访灾情,仍有许多地方水尚未退,乡人谈及饥寒交逼苦无生路,令人不忍见闻。十五日,往天津沿途水灾情形奇重。十六日,往乡察看房屋冲坍,无家可归者极多。<sup>[5]</sup>

冒着怒号的朔风,如掌的大雪,越过崇山峻岭,经过五天的艰苦行程,高鹤年终于赶到了灾区。看到灾民“饥寒交迫,苦无生路”的辛酸境况,高鹤年急欲救众生出离苦海。可是要解决饥民的吃住,就要用钱买粮安民,于是他又不顾一切南下募款。

从十七日出发,经过两天的行程,十九日到达上海。与上海佛教界知名居士狄楚青、王一亭、程雪楼等一起商谈救灾事宜。此后,高鹤年受上海佛教居士之托,从上海至普陀山法雨寺,再到宁波观宗寺,拜谒印

光、谛闲二法师,请他们参与赈灾事宜,均蒙发心相助。高鹤年返回上海之后,立即召集各大居士和诸山长老在上海玉佛寺开会,成立“佛教慈悲会”。经商定,由狄楚青综理一切会务,高鹤年任总务之职,负责分赴各地劝募赈款。高鹤年接受任务后分别前往苏州、杭州、常州、镇江、扬州等地,与佛教界人士洽谈,并请得冶开、济南二位上人以及苏州西园寺、杭州灵隐寺等寺院住持的大力协助,共同劝募赈款,劝办赈济会。最后终于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,募得大量的赈款。1918年3月,在冶开法师领导下,高鹤年等一行十余人携带赈款,到京津一带灾区进行赈灾查放事宜。由于受灾各县都来领取赈款,放款多少很难确定,最后按照同行曹乐钧先生提出的意见:“查灾放赈是最难办之事,其手续以查灾民户口为第一关键。查户真切,则事事有济;查户含糊,则项项虚糜。以救命不救贫为主旨,达到救人须救彻之目的”<sup>[6]</sup>,高鹤年等人又忍苦耐劳,亲自到各县认真视察,严守把关灾民户口,对受灾严重,无家可归者,一一予以救济。加上前期各处奔波,高鹤年终因心力交瘁而病倒,不得已回终南山休养。

这一次救灾,高鹤年志无怯弱,心无所畏,决定忍辱,真正的实践了佛法中忘小我、以达无我的菩萨精神。虽然自己终因积劳成疾,而回山休养,但是无数的生命因他而存活。高鹤年的这种真正实践佛法的精神,值得敬仰。

#### (二) 苏北赈灾

民国十九年(1930)春,苏北各乡青黄不接,灾民朝不保夕。高鹤年先抵押贷款,设置刘庄粥厂以救饥民,后又不分昼夜到处借款,增设白驹、安丰、戴窑三处粥厂。尽管如此,由于当时战乱,明抢暗劫者多,使得灾情雪上加霜。江苏省义赈会因筹款困难不能按期发粮,如果坐待义赈会的筹款,无数生命将填沟壑。考虑至此,高鹤年决定向上海居士简玉阶等人借款,同时在永丰圩、合塔圩、下圩、中圩、老圩等十四处设立粥厂。然而粥厂虽设,上海借款却久未到手,而此时因



为饥民日增,粥厂实在难以供给所需,奔走各方筹款的高鹤年也已经是精疲力竭了。

看到灾民奄奄一息,高鹤年彻夜焦急。无奈下,他叮嘱各船长稍后听信就写下遗书,决心“舍命保命”。心想如果到莲池庵投水自尽,上海诸居士就会急速汇款来,这样就可以救无数饥民的性命了。《山中归来略记》中称:

天明赶到城中,时有七艘粮船,停泊码头,待命发粮,余嘱各船稍迟听信,心则默持救苦救难观世音圣号,直向莲池庵走去,拟入莲池舍命,舍我一命才能救数十万人生命,只有瓮中搏鳖之法。<sup>[7]</sup>

就在高鹤年决心舍命向莲池庵走去时,赈务分工差役匆忙赶来,告诉他上海居士汇来6千元助办粥厂。这笔善款,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此后,高鹤年及时组织各地社会力量捐款救灾,同时联系中外慈善团体劝募补助,以“宁舍我一命才能救数十万人生命”的精神,赢得了时间,挽救了数万条生命。《大智度论》卷二十七强调大慈与小慈、大悲与小悲的区别说:“大慈与一切众生乐,大悲拔一切众生苦。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,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。……小慈但心念与众生乐,实无乐事。小悲名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,怜悯而已,不能令脱。大慈者令众生得乐,亦与乐事。大悲怜悯众生苦,亦能令脱苦。”<sup>[8]</sup>这是说小慈小悲仅仅停留在心念上,只是主观的同情、怜悯,而大慈大悲则给予众生以实际的关怀、帮助,使众生离苦得乐。由此看来,高鹤年真可以称得上是大慈大悲了。

### (三) 辛未救灾

高鹤年的救灾活动中,1931年的辛未救灾是对苏北地区的最大贡献。1931年8月29日,因天降大雨,苏北各县河流又久失疏浚,发生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,造成苏北各县尽成泽国。据高鹤年在《辛未水灾临时救命团日记》中描述:

江北大水,三坝齐开,不数日,运堤崩决二十七处,湖水横溢,漫天而下,内河各县,尽成泽国,庐舍倒塌,亿顷田禾,悉数沉没。……旦夕间,河水陡涨数

尺,村庄淹没,男女老弱,哀号乞命于洪涛巨浪中,即所住刘庄净土安老院外大觉精舍,水不及檐仅尺寸耳。<sup>[9]</sup>

当时高鹤年因南北救灾导致头目眩痛尚在莫干山修养,接到上海王一亭居士来电告知苏北大水后,立即赶回苏北,参加加筑运堤。因水势过大,运堤很快崩决,一霎时,男女老弱百千万生灵,哀号乞命于洪涛巨浪中。高鹤年见此情形,听着灾民的哀叫声,心急如焚,彻夜难眠。先是默诵观世音菩萨圣号以求加被,后决定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抢救生命。第二日,高鹤年与潘春霖、朱勉之、赵一寰等商议,设立临时救命团,组织刘、白水灾救生会。先购买船只作为救生船,并分救生船为六组出发。在救生中,对少壮者,救生船将之送往高地,并施以烧饼、生姜、红糖、火柴、药品作为临时赈品。对老弱妇孺者,救生船装回刘庄送往收容所。此后,高鹤年还与周梦白等办收容所六处,在刘庄、白驹组织耕牛寄养所,与石金声等放赈。至9月4日,虽然救生船救出了六七百灾民,但是水无退势,反因降雨而上涨,导致难民不减反增,而救命团款粮已所剩无几。无奈之下,高鹤年扶病沿途察看灾情,发觉只有将洪水排泄归海才可以从根本上救灾民。从9月15日至20日,高鹤年不顾病痛奔走于刘庄与大丰之间,调解了大丰垦区的泄水纠纷,使水位大大下降。此后在各地诸友和苏北救济会、国际救济会、中外慈善团、义赈会的大力支持下,到1932年5月苏北水灾才得以解决。

在高鹤年的努力下,成千上万的灾民得以安生。其功绩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,当地的群众,直到现在,还深深地怀念着他。为了纪念他,人们都尊称他为“高老爹”。苏北人民一提到“高老爹”的名字,就会肃然起敬,一些老人见到他的照片就情不自禁的下跪磕头。高鹤年的赈济救灾活动,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,他曾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发起人之一,民国十六年(1927)还助办了国际红十字会。<sup>[10]</sup>



### 三、高鹤年与刘庄净土院

在高鹤年的慈善事业中,创办刘庄贞节院,是他一生中备受人称道的善举。

民国十年(1921),高鹤年从滇粤回到故乡,正逢水旱交臻。虽尽散家财救济贫苦亲友,但只是救一时之急,还不能解决许多贫苦嫠妇老有所养、终有所归的问题。加之考虑到念佛茹素的妻子智氏年事已高,膝下又没有儿女,先祖先父的坟墓荒芜无人祭扫,备感交集,决定以自己的三亩地和部分房屋为基础,设妇女净土安老院,倡办各种慈善事业。但此时高鹤年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由于经济有限只能静待时机。正如他后来所说:“蒙佛悲悯众生,如昔日救济山西旱灾、京津大水、湘南兵劫,只要肯发愿牺牲,其中自有感应,因缘奇巧,不可思议。”<sup>[11]</sup>就在高鹤年发愿静待之时,李柏农(时任广东中山县长)访道而来。更巧的是,李柏农来找高鹤年就是想要在苏浙一带,设立道场以忏悔业障,挽回世道人心。就这样在李柏农、简照南、简玉介、沈惺叔、王一亭等居士出资相助下,安老院建设工程于民国十一年(1922)启动。中途因经济不续而面临告竭,又因缘巧合,忽得黄涵之、聂云台、赵去韶、关炯之、魏梅荪集款来助,工程完成大半。后又因江浙战乱停建,复得李柏农、简照南、简玉介、沈惺叔续发大愿,于民国十四年(1925)完成斋堂、客堂、延寿堂、祖堂、如意寮、涅槃堂、讲堂和厢楼等房屋共一百一十间的建设。建成的净土安老院由曾任江苏都督的程德全题写正面匾额“贞节院”,竖向嵌入正门上方,印光法师写《江苏兴化刘庄场贞节净土院碑记》,谛闲法师写《江苏兴化县刘庄镇净土贞节院碑铭》及《碑铭》,高鹤年亲自撰写《贞节院记》,备述其事。

贞节院建成之后,高鹤年就与印光法师商议修订章程。规定来此住者必须是贞女节妇,长斋念佛,决志往生,性情柔和,无诸乖戾,不事妆饰,不茹荤酒,断绝俗亲,不妄游行。此规定明确了贞节院具有不同于一般安老院、恤嫠局的地方。印光法师曾在《江苏兴化刘庄场贞节净土院碑记》中说:“以其事与恤嫠局相同,

其利益则天地悬隔故也,彼不过令其身有所托,不至饥寒,而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,不诵经咒,不戒酒肉,惟恤现生之志,不计没后神识之归于何所。居此院者,镇日持佛名号,晨昏恳切忏悔。岂但生有所托,不虚度日。兼令没有所归,永出轮回。”<sup>[12]</sup>正因贞节院的这种特点,起初来此修道的就有百余人,常住五六十人,她们按章程规约在贞节院过着佛教徒的修持生活,在修道之余,还参加生产劳动,种粮种菜、纺纱织布,为安心修道打下物质基础。

在灾难频繁的民国年间,贞节院众在高鹤年的带领下,本着慈悲济世的精神,积极参加赈济、收容难民,修桥办工厂等慈善活动。使净土院既是出世远离苦难的安养院,更是入世积极救济苦难众生的根据地、收容所。抗战期间,贞节院众努力农作织工,勉强维持生活外,尚能朝暮课诵,祈祷和平。1951年,贞节院全部房屋让与刘庄粮管所使用,粮管所则在原刘庄报恩庵内建房三间以交换,全体院众连同佛像搬迁至报恩庵。“文革”十年浩劫中,佛教遭受了很大的冲击,贞节院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刘庄粮管所将贞节院全部拆毁,改建仓库,佛像经藏均被销毁,静修妇女也被驱散,只有高鹤年旧居“大觉精舍”得以保留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政府落实宗教政策。1983年,贞节院开始恢复,由高鹤年的学生王光钺居士担任院长,孙勤居士任副院长,开始努力恢复和重建贞节院。在二位院长的努力争取下,1993年,大丰粮管所将贞节院原址土地全部归还佛教界。同年,成立“江苏省大丰县刘庄净土院修复委员会”,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茗山法师任主任委员,明开、明学、慈舟法师任副主任委员,江苏省各名山大刹及上海佛教界等诸多知名人士任委员。1994年11月开始动工,整个重建工程分四期进行:第一期修建山门天王殿;第二期建寮房、斋堂、大殿和高鹤年居士纪念堂;第三期建延寿堂、祖堂和东西厢房;第四期建养心堂、归元堂和东西花园。<sup>[13]</sup>



云散日现,重建后的刘庄净土院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。虽然它历经沧桑,遭到不断的破坏,但是事实证明枝叶易损慧根难移。今天,当人们走近它时,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高鹤年的精神。正如印光法师于民国二十五年(1936)为高鹤年所作的“像赞”中所说:“人言居士性甚偏,我谓所偏即是圆,由偏故不理家计,由偏故参同教禅,由偏故云游全国诸名胜,由偏故遍参宗教诸高贤,有偏故专修净土特别法,由偏故普令同仁结净缘,由偏故不立嗣续舍家为庵,安住贞节,俾全其天,今已将离此五浊恶世,直登西方极乐世界之九品莲花”<sup>[14]</sup>。这九个“偏”字,彰显出高鹤年慈悲利世、个人与众生平等、出世即入世的精神。正是高鹤年修学佛法的这种精神,使他“直登西方极乐世界之九品宝莲”。高鹤年已去,他的精神永存。在《江苏兴化县刘庄镇净土贞节院碑铭》中,谛闲法师曾赞扬高鹤年创建刘庄净土院,是上宏佛法,下恤嫠贫,功德难伦的壮举,因而可以“泽流永远,惠及来今”<sup>[15]</sup>。如今,刘庄净土院已成为大丰市的文物保护单位,而院内西侧偏南“高鹤年居士故居”(赵朴初题写,即大觉精舍)则成为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### 小 结

大乘佛教的慈悲济世,出世与入世圆融不二的思想历来受到中国佛教的重视,在中国历史上,出现了不少致力于赈灾济困、兴办慈善事业的高僧大德。在近代,高鹤年居士将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慈善事业上,积极救灾,开展各种慈善事业,是当时佛教界的一个典型。从态度上看,高鹤年在闻知灾难后,不管路途有多遥远,天气有多糟糕,身体有多虚弱,总是如救头燃不顾一切地前往。在救灾过程中,不论是京津赈灾还是苏北救灾,看到灾民在哀嚎惨叫时,总是彻夜不眠,白天继续奔波。有时救灾还未结束他就头目眩晕,病体不支,但仍扶病继续救灾;有时实在难以支撑病体,则待灾情稍缓才不得不回山中养病。古人将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称之为“三德”,综观高鹤年的一

生,他为求佛正知见而行脚参访真善知识,其苦修勤参,持戒念佛,弘法利生,不可不谓立德;他为诸高僧大德复兴佛教护法,几十年如一日的全国救灾,为了众生创立刘庄净土院,不可不谓立功;他将一生中行脚参访、救灾事业的过程和心得一一记录下来编成《名山游访记》,不可不谓立言。因此可以说高鹤年是佛门中三德具备之人。高鹤年在救灾中真正地实践了大乘菩萨难忍能忍、难行能行的精神。正是在这种精神影响下,不少佛教界高僧大德和居士积极参加救灾等慈善事业,使佛教界在近代慈善事业中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凸显了出来。

### 【注 释】

- [1] 高鹤年:《名山游访记》,江苏省佛教协会印,1986年1月,第10页。
- [2] 黄常伦:《方外来鸿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2年4月,第92页。
- [3] 黄常伦:《方外来鸿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2年4月,第137页。
- [4] 同上,第145页。
- [5] 于凌波:《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9月,第402-403页。
- [6] 高振农:《民国年间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资料点滴》,《法音》1998年第10期,第29页。
- [7] 高鹤年:《名山游访记》,江苏省佛教协会印,1986年1月,第252页。
- [8] 鸠摩罗什译:《大智度论》卷27,《大正藏》卷28,第26页。
- [9] 《近代江苏宗教》,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,1990年12月,第204页。
- [10] 黄常伦:《方外来鸿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2年4月,第252页。
- [11] 高鹤年:《名山游访记》,江苏省佛教协会印,1986年1月,第253页。
- [12] 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卷4,《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·藏外佛经》第17册,第162-163页。
- [13] 《大丰市文史资料》,第15辑,大丰市政协文史委员编,2008年12月,第163-166页。
- [14] 黄常伦:《方外来鸿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2年4月,第16页。
- [15] 《谛闲大师语录》,《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·藏外佛经》,第19册,第305页。